

晋源一年有十一个庙会，实属罕见。有句俗语“城隍里人请客，一个手拽人，一个手推人”，把城里的老百姓因赶会待客的繁多、无奈和应酬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几乎月月有会，得耗费多少财力、物力、时间去应酬。据老人们说，月月有会，还得根据不同时节，准备不同伙食。

十一个庙会承载了怎样的信仰、追求和祈望？

正月十五，晋源东街，三官庙庙会。三官庙位于县城东南，北向。东西宽约30米，南北长约75米。三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信仰，渊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。在原始时代，天、地、水是人们生产、生活的必要条件，没有它们，人类无法生存，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，虔诚地顶礼膜拜。同时也把对华夏民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尧、舜、禹称为三官：天官唐尧、地官虞舜、水官大禹。

二月二，晋源东街，文昌帝君庙庙会。文昌庙位于县城东关，南向，东西宽约50米，南北长约70米。文昌帝君是汉族民间和道教尊奉掌管世人功名利禄之神。人们借此表达文运昌盛、进取功名的愿望。

三月十一，晋源北街，关帝庙庙会。关帝庙又名关王祠，俗称“老爷庙”，位于县城北街路西，坐西朝东，占地约4200平方米。关帝是忠义、勇武的象征，后人祈望其护佑一方平安。

四月二十八，晋源南街，药王庙庙会。药王是道教俗神，由中国古代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名医演化而来。一为神农，尝百草，首创医药；二为扁鹊，洞晓医源，深明医理；三为孙思邈。民间祀之，祈求治病祛疾，身体健康。药王庙会通常要熬煮牺洒，一直喝到端午节。

## 晋源庙会多

希夷

五月二十七，晋源南街，城隍庙庙会。位于县城南街之东，南向，东西宽120米，南北长约238米。城隍是城池的守护神，是负责阴司司法的第一关卡，维系着地方安危。县城城隍庙规模很大，设有公座笔砚，壁有城隍、判官、牛头、马面等，还有上刀山、下油锅等壁画，显灵殿中没有机关，踩上踏板，就有小鬼将铁索套住脖子。

六月二十八，晋源西街，尹公祠庙会。尹公祠在县城西门外百余米处，路北，坐北朝南，占地约2400平方米，是一座四合院落，布局严整整齐。尹公即尹铎。晋阳古城创建者董安于死后，尹铎接任，治理晋阳，加强城防，减轻百姓负担，民众安居乐业，后人立祠堂祭祀。

七月初五，晋源东街，河伯祠庙会。河伯祠，又叫河神庙，位于县城东关路北，南向，占地约890平方米。河伯，神话传说里的水神。县城东门名曰“观澜”。不远处就是汾河，自有祈望河水平安之意，也隐喻晋水与晋阳的关系。

七月二十二，晋源西街，玉皇庙庙会。玉皇庙位于县城西街，城门之北，坐北朝南，占地约1500平方米。玉皇，亦称昊天上帝、玉皇大帝，统领三界十方诸神与四生六道芸芸众生，并权衡世间兴隆衰败、吉凶祸福，是三清之下、四御之上的大神。玉皇大帝在汉族民间信仰中影响极大，祭拜仪式几乎超越了三清的规格，比一般神明来得隆重。

八月十五，晋源东街，先农坛庙会。先农坛位于县城东关南隅，南向，占地约1554平方米。先农，远古称神农、王社，至汉时始称先农。先农为国之六神（风伯、雨师、灵星、先农、社、稷）之一，每逢开春，皇帝率文武百官行籍田，礼于先农坛。各级官吏也循例行之。南街城外有迎春道遗迹，是籍农田场所。

九月十五，晋源南街，龙天庙庙会。龙天庙位于县城南关，隔宝华阁与南城门相对，北向，占地约1660平方米。龙天庙是祭祀汉文帝刘恒的家庙。据史书记载“高祖十一年(196)立子恒为代王，都晋阳。”刘恒治理晋阳十七年，施仁政，轻徭赋，发展农业，深得晋阳人民的愛戴和敬重。后来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，四次回晋阳，晋阳人立庙祭祀。

十月十一，晋源南街，财神庙庙会。财神庙位于县城南街宋家巷西口，占地约540平方米。传统观念中，财神爷是掌管天下财富的神祇，倘若能够得到他的保佑眷顾，便可财源广进，家肥屋阔。

晋民俗

## 国练村

张贵桃

国练村地处娄烦县西南端约16公里处，为著名的米峪镇战斗主战场。1940年6月，贺龙指挥八路军120师358旅在米峪镇一带全歼日军村上大队700多人。

国练村应为圜圜村。《静乐县志》“圜”写作“口”字中放一个“谷”字，“圜”拿“圜”代替。清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《普净寺重修山寺碑记》即写为圜圜村。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续修《静乐县志》，写为谷恋村，革命战争时期改为国练村，并从此定型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（湖北辞书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）第722页：“【圜圜】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，多用于村镇名，如马家圜圜（在内蒙古）。今多译作‘库伦’。”娄烦境内，夏商周时期楼烦国“世为荒服”，长期处于汉族国家的边陲地带，曾为胡汉杂居地区。直到公元前296年以后，赵武灵王灭楼烦国，建楼烦县，娄烦境内的胡人才逐渐退往北方。由此可知，“圜圜”的村名，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先民在这里养马时起的名字。从“圜圜”两字的字形看，是两个会意字，把四方八面围起来，不就是个圜吗？它不是汉语词汇中的基本词，在当时来讲是个外来词，是有了这个词后，才用汉字中的会意方式新造了这两个字。只是因为“圜圜”这两个字比较生疏，人们为了方便，才把“圜圜”写成“国练”。

以畜牧为业的胡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放牧呢？因为娄烦历史上水源充足，草坡广阔，天气寒冷，而且水草资源丰富、稳定，在这种环境中定居放牧，显然比在沙漠草原地区追逐水草游牧要优越得多。

晋地名

# 警卫员的故事

梁计元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杨昌富，祖籍五台县。家境贫寒，欠下村里地主的地租，无法偿还，在1940年，年仅九岁的他随父亲杨老六与母亲范金莲，躲债来到晋源赤桥村。1948年，十七岁的杨昌富已长大成人，高高的个子，英俊标致的脸庞，在村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好后生。

太原解放战役期间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、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等领导，以及前线指挥部，曾驻在赤桥村。地处晋源地区且早已获得解放的赤桥村民，见解放军大军驻扎村内，莫不欢欣鼓舞。男人们抬担架支援前线，女人们则为解放军缝补、拆洗衣被。村里的年轻人，更是兴奋异常，踊跃报名参加。杨昌富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据说，杨昌富家与兵团周士第所住的院子不远。有一天，周士第见杨昌富从门前担水走过时，便叫住他说：“小伙子，我调查来，你是贫苦人家出身，又是迁来赤桥的五台人，与徐司令员是老乡。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，来指挥部当警卫？”

杨昌富听了，高兴地答应说：“我愿意！”

就这样，杨昌富当了周士第的警卫员。

晋中战役胜利后，阎军头目赵承绶被活捉。兵团首长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，立即派杨昌富等警卫战士赶到平遥，将在平遥投降的一批阎军将领押回来进行审讯，让他们提供太原城内及城外的兵力部署情况。兵团首长们将所获口供细致分析后，把太原敌情向党中央作了汇报。上级为更有把握拿下太原城，特意从四野调来炮兵部队。

为了将炮兵部署在打太原的有效射程内，周士第亲自带队赴西寨村东北处的汾河湾部署炮火。杨昌富也

## 《华严石经》与晋阳

冯巧英 赵桂淇

唐代翻译的八十卷《华严经》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佛教经典，这部佛典译毕不久，就镌于石上，置于晋阳，至今大多保存完好。

晋阳铸经典

八十卷《华严经》这样一部堪称国宝的佛经，为什么会镌刻、安置于晋阳，并得以保存千余年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。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：

其一，从晋阳的历史地位考虑。晋阳，自公元前497年建城，至宋初旧城毁，一直是北方重镇。五胡十六国、北朝时期几度成为政治中心。有人总结，从北魏后期到五代，四百多年间，几乎形成谁占有晋阳谁就可以得天下的局面。如：晋阳被北周攻陷，一个月后北齐就灭亡。晋阳是唐王朝的“龙兴”之地。武德二年(619)刘武周攻占晋阳，李渊惊恐，甚至想“弃大河以东，经营汉中之局”；新生的唐王朝亟亟可危，李世民率军出击，一路作战，收复了晋阳，保有了新王朝的战略基地。五代时有三朝以太原为都，后汉凭太原能和后周、北宋抗衡二三十年，可见中古时代太原的战略地位。

其二，从武则天与晋阳的特殊关系考虑。从则天皇帝当时政治环境看，长安是李唐的建国之都，李唐朝廷的政治势力自然根基扎实，所以武则天长时间在神都洛阳听政。洛阳虽然已培养了一批武周朝新贵，可根基如何，尚来不及检验。晋阳，既是李家龙兴之地，又是武则天祖籍，武家亲旧从龙之臣众，自然基础好。她立为皇后不久的显庆五年(660)就与高宗一起巡幸晋阳，期间，减免当地赋税、商税，给地方官加勋级，亲族故旧“赐帛各有差”，版授当地八十岁以上老人为“郡君”，等等。她称帝第七年，钦定太原为“北都”。这一切，政治用意不言自明。

其三，我们还应特别留意晋阳一带浓厚的佛教氛围。查历史上北魏至北齐是一段极为崇佛的时代，从高欢掌控东魏，以晋阳为霸府，到高洋建北齐，以晋阳为陪都，到北齐亡，前后不满50年，高家父子祖孙在晋阳西山广建佛寺，开凿石窟，造佛像，雕佛像，佛教极为兴盛。北齐亡后虽经周武灭佛、社会动荡、战乱频仍，但许多佛寺、佛像还是保存了下来，整个社会对佛教的信仰依旧，或更加深入人心。显庆五年(660)，武后和高宗登龙山童子寺瞻礼，还赋诗抒怀。可以说，从北齐至唐，佛教在晋阳从未衰竭过。

风峪藏石经

关于《华严石经》，官书也罢，地方史志也罢，为什么很少提及呢？检点《华严石经》初刻原始记录，已逸不可得。明《永乐大典》转引《元一统志》记载，元代晋阳古城西三里的风峪石经藏院所藏为“唐人所书《华严石经》”。那么，初刻于武周后期的《华严石经》，风洞是它原来的供奉处吗？如果是，为什么？

晋阳《华严石经》受冷落，恐怕第一是政治原因。石经的镌刻是在则天女皇亲自倡导督促下进行的，内中包括了 她新造的字。李家复唐后，哪怕从肃清政治影响的角度，也不会大肆弘扬。其后四十多年又遭武宗灭佛，像这样的佛门之宝，能存在下来就属不易，官、私都以不张扬为宜，故而官方各种记载基本没有相关记载。唐代，私人笔记类著述还未成风气，石经逐渐不被大众所知。

石经，从政治清理的角度已不宜张扬，但它又是佛门重要典籍，是多少人的心血和精神寄托，猜想当时费了一番筹划，将它们安置在了风峪口旧寺的大殿底层。

所说这座旧寺，要从北魏说起。史书记载，北魏迁

随同首长前往。不料，他们在汾河湾的一条农渠上，突然与阎军的一小股巡逻兵相遇。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便迎头撞上，甚至来不及开枪射击。

只听周士第一声令下：“拼刺刀！”警卫战士们就冲了上去。

这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！杨昌富个头大，出手狠，接连刺倒两个向首长扑过来的敌人。

当他刺入第二名敌兵身上的刺刀还未拔出来的瞬间，迎面又一敌兵端着刺刀朝他刺来。杨昌富来不及拔刀，只好用双手紧紧抓住对方的刺刀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一声枪响，那个阎军脑瓜当即开了花。杨昌富扭头一看枪响处，原来是周士第救了他一命。杨昌富顿时就来了一股不怕死的勇气，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双手已被刺刀划割得鲜血淋漓，而是立马从敌人身上拔出刺刀，护着周士第，与战友们一鼓作气，向敌军杀去。

战斗结束后，周士第一看杨昌富双手鲜血淋漓，赶紧让人给他包扎。

后来，为了进一步摸清太原外围敌情，杨昌富又随周士第来到南堰村北视察战地情况。不料刚出村不远，只听轰隆一声，周士第骑的战马踏响了地雷，连人带马朝前栽了下去。

杨昌富立即扑上前去，把周士第从地上扶起来，着急地问：“首长没事吧？”

周士第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急忙看他的战马，只见马的一条腿已断了半截，倒在地上挣扎。见状，周士第吩咐把战马先弄回南堰村里去，然后转身要步行去前线。

当下，好几个警卫员都劝首长说：“要不咱们先不要去前线了，先回村休息休息再说。”

周士第说：“怎么！你们怕了？”

众人一听，都知道首长那股不怕死的脾气又上来了，谁也劝不住他，只得跟着首长步行去前线视察战况……

打下太原后，那个密告黄樵松军长起义的戴炳南，见大势已去，为了保命，费尽心思，先是炮制了一个坐汽车遭炮弹轰炸死亡的假象。尔后，又藏在他连襟家的隔墙中逃避搜查。不想恶有恶报，藏来躲去，没过两天，还是被解放军活捉了。

后来，杨昌富回忆起这段历史时，说：“解放军抓住戴炳南，把他从连襟院里揪出来时，我就在现场。”

舟船鞍马，交替前行，白家历时两个多月，行程数千里，一天天接近了大运河最南端，即将止步于杭州古城。

大运河春秋末年开掘，隋唐通航洛阳，转广通渠可抵长安。到元朝从淮水改凿向北，竣工京杭大运河。运河开凿历时悠久，给历代官员提供了一整套治水教科书。做官不懂治水，则不懂执政之道。白居易最心力的官职竟是“水官伯”，可惜一直未能如愿。年轻时，白居易与元稹备考策试科举，挥汗完成《策林》七十五篇，第一篇专为治水谋策，曰《辨水旱之灾，明存救之术》，明确指出治水可以“保邦邑于危，安人心于困”，并说减灾防患，责在郡使。凡大难来临，天灾乎？人祸乎？唐玄宗叹曰，“诸州遭涝之处，多是政理无方，或堤堰不修，或沟渠未泄”，将水旱灾害成因，归结到官政郡治才是根本。

古代中国，水旱灾害频频。在白居易看来，水旱灾害分人灾、运灾两种，人灾可以避免，运灾虽然难以全避，但通过官民有力措施，可以减轻损失。他告诫高层乃至郡县官员，必须持公道而施善政，调动各种手段，防灾减灾救灾赈灾，拯救百姓于水火。而州郡刺史乃防救灾害主要负责人，自当全力组织地方防涝抗旱，修筑堤堰，固土祈福，以期有备无患，逢凶化吉。

白居易治水言论精辟，也是大唐帝国上下共识。据研究，单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统计，自春秋至隋朝，共建水利工程六十四项，进入唐代，兴修水利工程达到一百零四项。也就是说，唐朝治水，远超前千年积累。强国建立在治水功德之上，而诸州刺史正是指挥完成各项工程的直接主官。每逢开工，刺史大举动员成千上万民众投入劳作，如大和七年(833)河阳修堰，出动役工达四万之众。就当时生产力而言，有多么艰难，又何等壮观。

白居易途经南阳内乡之际，相逢老友张籍，二人彻夜长谈。张籍时任工部所属之水部员外郎，此时正以水务大臣身份巡视水利和漕运。而张籍上任水部，制书乃白居易所撰写。江淮旱灾十分严重，万千“疲民”嗷嗷待哺，白居易恰恰前往杭州灾区上任，他们此刻相逢，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

接下来，白居易过了洞庭湖口，随即到达故地江州，与同龄刺史李渤相聚。开元和十年(815)，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，与这位李渤同日黜官，李改为资议参军，分司东都。眼下，白、李竟在江州相聚，二人百感交集，共上庐山，交流尤为深入。目前李渤江州任上，“曾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，今年旱死一千九百多顷”，年景歉收现实严重，而财政昏官仍在横征暴敛，还要征收往年拖欠，李渤拼死上奏，强烈要求皇室免除百姓当年负担，并明确表示自己“不忍鞭笞黎庶”，如不准奏免赋，则“特乞放臣归田”，甘愿弃官。穆宗这才批复“江州所奏，实为诚恳”，准予免赋，州民得救。

就是这样一个好官，今夜举杯过头，郑重相告白公，为了抗旱，他正在积极筹划治理本州甘棠湖，准备筑堰安水，建桥定闸，调控湖水，以保早涝灌溉之利。居易闻言大震。史载当年十二月，甘棠湖工程果然如期开工，“筑堤三千五百尺”，次年正月竣毕，“蓄水为湖，人得其赢”。白居易与郢州王谏、水部张籍、江州李渤等务实官员次第相逢于赴任途中，深入交流，对于执政杭州大有深意。

这些朝官彼此激励互勉，可以迸发出惊人力量。如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包括宋代苏东坡等人，皆在贬后励精图治，为一方土地经济、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，书写了功德一页。白居易在忠州同样如此。他们历经挫折不幸，却往往成为落后地区进步突变的难得契机，给当地黎民带来幸运祥光。

张籍、李渤坐论治水，令杭州白刺史深受鼓舞。乐天年轻时为民间喊请命，如今更要为百姓兴办实事。

白居易一贯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此番赴任路上，诗人与诸友热议治水，又亲眼目睹了洞庭浩瀚，“混合万丈深，森茫千里白”，利可兴社稷，害可吞黎民，他面对洪涛骇浪，胸中豪情不可平复。

长庆二年(822)，居易途经洞庭之夏，“长江倒灌，湖区大灾”。他写出《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》，充分抒写难以遏制的治水情怀，完成了又一首重要诗篇。此诗撼人心魄：

江从西南来，浩浩无旦夕。长波逐若泻，连山雷如劈。千年不壅溃，万姓无垫溺。不尔民为鱼，大哉高之绩。导岷既艰远，距海无咫尺。胡为不沦功，余水斯委积。洞庭与青草，大小两相敌。混合万丈深，森茫千里白。每岁秋夏时，浩大吞七泽。水族窟穴多，农人土地窄。我今尚嗷嗷，禹岂不爱惜。邀未究其由，想古观遗迹。疑此苗人顽，恃险不终役。帝亦无奈何，留患与今昔。水流天地内，如身有血脉。滞则为疝疣，治之在针石。安得高复生，为唐水官伯。手提倚天剑，垂来亲指画。疏河似剪纸，决壅同裂帛。渗作青陵田，蹋平鱼鳖宅。龙宫变闾里，水府生禾麦。坐添百万户，书我司徒籍。

据考，乐天此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记载洞庭水患之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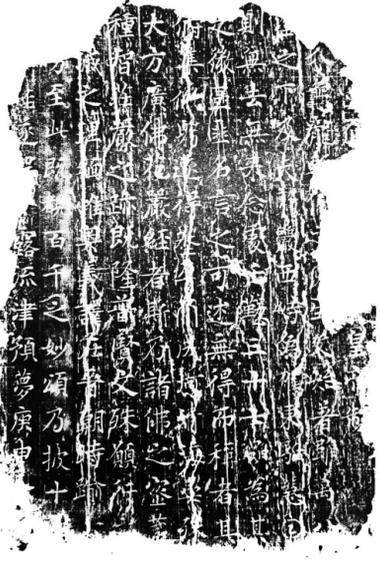
全诗可分三部分赏析，第一部分写长江气势和大禹功绩；第二部分写洞庭、青草两片大湖，侵蚀农田，乃至“水族窟穴多，农人土地窄”；第三部分希望大禹复生，实现“龙宫变闾里，水府生禾麦”的美好愿望。全诗想象奇特，雄健豪迈，一气呵成。“水流天地内，如身有血脉。滞则为疝疣，治之在针石”，说明白居易对于疏导水流、掘开堵滞的治水原理，已有正确认识。最后两句“坐添百万户，书我司徒籍”，采用了刺史公务用语入诗，说的是大唐户部，执掌国家土地、户籍、赋税、军需、俸禄、粮饷等一应财政收支相关之事，而州府刺史必须完成户部各项年度指标，以对应考核。户部以及各地节度使、观察使，对州级刺史年考首要指标，正是人口田亩之增长。

张卫东在《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》一书中指出：各地刺史对治下人口的升降变动，甚为敏感，无不以促成本地人口田亩的迅速增加为首要施政目标。

白居易熟知刺史要务并亲履忠州刺史之职，此时怀抱终止湖水泛滥、增添人口良田的美好理想，以期“坐添百万户，书我司徒籍”，力图通过治水尽刺史职责。正如陈子昂所说：“一州得贤明刺史，以至公循良为政者，则千万家赖其福；若得贪婪刺史，以徇私苛虐为政者，则千万家受其祸矣。”（《上军国利害事·收宰》）详读此诗，探讨白居易彼时执政情怀，心胸自见。

## 白居易治水之识

赵瑜



《大方广佛华严经·卷第一 则天皇帝亲序》拓片